

《史记》

叙事学研究

刘宁 著

在中国，历史叙事成熟早、影响大，处于权威地位，而《史记》作为中国历史叙事的经典作品，具有叙事学研究的可能性与典范性。本书运用西方叙事学理论解释《史记》，从叙事者、文本到读者，从结构、话语到细节，从叙事立场、叙事视角到叙事时间诸多方面展开，同时也间接回答了历史叙事文本的主体性与客观性、真实性与虚构性等问题。



《史记》

叙事学研究

刘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记》叙事学研究 / 刘宁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 - 7 - 5004 - 7322 - 0

I. 史… II. 刘… III. 史记—叙述—文学研究

IV. I206.2 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1866 号

策划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沂 涟

责任校对 刘 俊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25

插 页 2

字 数 239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刘宁同志的《〈史记〉叙事学研究》一书是她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即将付梓，她嘱我写几句话。作为刘宁同志的指导教师、也是该论文的第一个读者，我很乐意借这个机会谈一点感想。

说起《史记》，我们自然会想到它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处于西汉武帝的盛世时期，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但司马迁个人的命运却是很不幸的，由于李陵之祸而受宫刑，奇耻大辱使他痛不欲生，但为了《史记》，他坚强地面对灾难，正如他在《报任少卿书》中所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他忍辱负重，终于以顽强的毅力、毕生的心血铸成了历史的长城——《史记》。他把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生的认识都灌注在《史记》之中，使《史记》不再是简单的资料汇编，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经典之作，也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明珠，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由于它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叙事生动、语言多彩，而成为史学家、文学家学习的榜样，历代对于它的研究也一直没有中断。根据史书记载，《史记》在魏晋南北朝以后流传到了国外，引起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在日本，已经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史记》研究队伍。目前，《史记》研究方兴未艾，以至于形成了一门重要的学

问——“史记学”。“史记学”涉及史学、文学、哲学、民族学、地理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档案学、新闻学、天文学、医学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刘宁同志在认真阅读《史记》的基础上，广泛查阅了从古至今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成果资料，最终选定从叙事学角度对《史记》进行研究，这个选题颇有意义。因为历史叙事是中国叙事文学中一个重要方面，它成熟早、影响大。甲骨卜辞、卦爻辞、铭文作为现存最早的文字记录之一，已具有了一些叙事的因素和特点，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后续发展，尤其对叙事文本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历史叙事文本中，《尚书》《春秋》处于早期历史叙事的起步阶段，各有一定的特点。《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记言、记事是早期历史记载的主要特征，有较明确的时间观念，但这些记事还缺少必要的文学色彩。到了《左传》《战国策》《国语》等，历史叙事已经成熟，而且成就突出。就以《左传》来说，张高评先生在《左传之文学价值》一书中概括前人评点之说，归纳《左传》有正叙、原叙、顺叙、逆叙、对叙、类叙、侧叙、预叙、插叙、暗叙、倒叙、补叙等30种叙法。《史记》在前代历史叙事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达到了中国历史叙事的辉煌顶峰，代表了中国历史叙事的最高成就。可以说，以《史记》为对象展开叙事学的研究具有典范性的意义。

叙事学理论，是当今西方学术界重要的文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译介到国内，对中国文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成果。借用西方叙事学的理论来研究《史记》的文学形式和文学特征，这是一项很有新意的尝试。刘宁同志从叙事视点、叙事情节、叙事时间、叙事结构、叙事话语、叙事接受等方面进行《史记》叙事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如，叙事视点部分通过与之相关的叙事者、叙述立

场、叙述角度等方面对《史记》的叙事进行解释，由此揭示叙事者主体性对叙事文本以及读者所产生的影响。对《史记》情节的研究，作者认为《史记》叙事存在浪漫、讽刺与悲剧三种情节类型，它们分别隐喻着叙事者的理想、批判和同情，这三种情节的存在，形成了《史记》叙事的张力，也形成了《史记》的反讽意味。对《史记》叙事时间的研究，作者注意从历史叙事时间与历史时间的区分上探索叙事主体的方式特征，揭示了“复调”在叙事中的运用效果，指出《史记》叙事中司马迁所关心的不是宏观历史的经验与教训，而是人的情感生活和命运，因而体现在叙事中的时间过程，就不是体现普通道德意义的客观事件逻辑，而是体现特定个人性格和命运的生命历程。《史记》结构研究，主要从《史记》的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进行分析，认为作品的外部结构、内部结构都是作者主体性的很好的表现，体现了作者深层的意识形态选择。《史记》历史话语分析，作者认为叙事话语的策略与技巧并不是纯粹的形式问题，成功的叙事向来是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形式中实际蕴含了意识形态内容，带有一定程度的话语权力，并从《史记》历史话语的外语境、内语境、话语模式及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总体来看，作者对叙事学这一基本理论理解掌握得比较好，运用自如，尽管个别地方的论述还显薄弱，但作者能够自立一说，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对于《史记》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这是难能可贵的。

《史记》是文史结合的典范著作，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的描写，化腐朽为神奇，使死的冷冰冰的资料变成活的热乎乎的生命，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叙事，又不同于纯文学的艺术虚构，正如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所说，《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传》是“因文生事”。但是，《史记》的历史叙事方法却对中国纯文学的叙事作品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小说、戏剧等。刘宁同志结合自己的专业特点，在全面掌握历史叙

事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着重挖掘《史记》历史叙事的文学特征和价值,由此展现《史记》在中国叙事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样的研究,重点突出、线索分明。我们通读全书就会发现,作者对每一个问题的论述,重点都在叙事的文学特质方面,叙事视点、叙事情节、叙事时间、叙事结构、叙事话语,凸显出来的是文学的审美和文学的效果。叙事接受一章,作者把《史记》放到整个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进行分析,探讨历代文学家对《史记》叙事的接受,这是前几章内容的归结点,既进一步突出了《史记》历史叙事的文学特点,又体现了历史叙事对文学叙事的影响。如此一来,《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便明晰可见了。当然,作者还特别注意到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联系与区别,并注意从辩证的层面理解两者的关系,在“余论”中对叙事的主体与客体、实录与想象等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显示了作者对中国叙事文学的全面认识。

由刘宁同志的研究,我想到目前《史记》研究如何进一步深入的问题。从《史记》研究史看,两千多年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许多问题,也解决了许多问题,也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挖掘,还有许多问题虽然有人提出但没有很好解决。《史记》研究要深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以为最主要的是要在整理前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就是要看准问题,选准角度,用合适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问题。如《史记》叙事问题,前人已有涉及,从汉代的刘向、班固,唐代刘知几的《史通》,一直到清代刘熙载的《艺概》等,都有一定的评论,但比较零散,还没有形成体系,没有从理论上进行升华。借用叙事学理论,我们可以把零散的研究统帅起来,进行整体性的研究,这样就上了一个档次,就有了新意。类似的问题还很多,如司马迁“爱奇”的问题、司马迁、班固的异同、《史记》与古典小说的关系、《史记》与经学的关系等。这些问题,

前人或多或少都有涉及，但都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入，而不能停留在简单、零碎的评论层面。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更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善于借鉴国外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史记》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当然要注意不能生搬硬套，不能玩弄新名词。如借鉴国外挫折心理学、创造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等理论，深入探讨司马迁在逆境中的创作心理和创造意识；借鉴接受美学理论，以读者为立足点，从历时性与共时性、接受的目的与方式、接受的效果与反应等方面深入探讨《史记》的价值及其影响等。总之，理论研究有助于问题的深入。没有理论的深化和总结，就无法使研究有深度。目前的《史记》研究已在这些方面有了一定的起色，出现了一批有学术特色、有理论深度的著作。期望《史记》研究者能继续扩大成果，使理论研究更上一层楼。

学无止境。刘宁同志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思想敏锐，学风严谨。我期望她以《〈史记〉叙事学研究》为起点，在学术研究方面不断努力并取得新的成就。是为序。

张新科

2008年2月25日

目 录

序言	张新科(1)
绪论	(1)
一 历代《史记》叙事研究回顾	(1)
二 本书研究的方法及意义	(13)
第一章 中国叙事传统溯源与早期历史叙事的发展	(21)
一 中国叙事传统溯源	(21)
二 中国早期历史叙事的发展	(37)
第二章 《史记》叙事视点研究	(60)
一 叙事者及叙事动机	(61)
二 叙事立场	(70)
三 叙事视角	(88)
四 聚焦	(99)
五 盲点	(103)
第三章 《史记》叙事情节研究	(108)
一 情节类型及其隐喻性	(109)
二 情节组合的意义:反讽意味的生成	(138)

第四章 《史记》叙事时间研究	(146)
一 时间观念的产生	(146)
二 时间观念与历史叙事在哲理上的融通	(153)
三 历史叙事时间	(157)
四 叙事的时间顺序	(160)
五 叙事的时间速度	(165)
六 叙事中的时间意识分析	(168)
第五章 《史记》叙事结构研究	(173)
一 整体结构的深层意义	(175)
二 编排顺序的密码破译	(187)
三 内部结构的关键:命意	(194)
四 具体篇章的组织:谋篇	(203)
第六章 《史记》叙事话语分析	(215)
一 叙事话语的外语境	(216)
二 叙事话语的内语境	(226)
三 叙事话语模式及意识形态	(233)
四 叙事话语的特点:复调	(235)
第七章 《史记》叙事接受研究	(246)
一 传播与接受的途径	(246)
二 接受者分析	(254)
三 接受与经典化	(265)
余论:实录与虚构——关于历史叙事本质的思考	(269)
参考文献	(276)
后记	(285)

绪 论

在中国历史叙事文本中,《尚书》《春秋》仅仅处于中国早期历史叙事的起步阶段,它们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左传》《战国策》《国语》处于中国早期历史叙事的基本成熟阶段;《史记》处于中国历史叙事的辉煌顶峰,代表了中国历史叙事的最高成就。一部《史记》,犹如一座叙事艺术的宝藏,历代文人学者都曾不断地挖掘、开发,从汉代扬雄、班固,到唐宋的韩、柳、欧、苏,以及明清的古文家、评点家,近现代的研究家。可以说,以《史记》为对象展开叙事学的研究具有典范性的意义。

一 历代《史记》叙事研究回顾

历代对《史记》叙事的研究,各有特点,取得了不同的学术成就,这里,我们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对两千多年的《史记》叙事研究略作回顾。

(一) 汉魏六朝:起步阶段

《史记》问世后,首先得到了西汉扬雄、桓谭等人的赞许。扬雄在《法言·重黎篇》中说:“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在《法言·君子篇》中说:

“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①“实录”说为后代《史记》的叙事研究定下基调，而“爱奇”说则揭示了《史记》叙事风格形成的创作主体因素。桓谭在《新论》中说：“通才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为广，余皆丛残小论。”^②这就从两个方面肯定了司马迁和《史记》：一、司马迁是通才人物；二、《史记》是一部宏大的叙事著作。

东汉班彪、班固父子对《史记》有深入的研究，他们对《史记》叙事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总结《史记》的编纂体例，肯定其开创纪传体之功。班彪说：“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迄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又说：“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③第二，高度评价司马迁的史才和《史记》的叙事价值。班氏父子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④在古代史学评论中，“良史之才”和“实录”可以说是对史家和史书的最高褒奖。第三，称赞司马迁博学，《史记》内容广泛。班彪认为，“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播也”。班固也盛赞迁之博物洽闻，“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第四，赞赏《史记》详近略远的叙事原则。在班彪看来，“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班固也认为：“其言秦汉详矣。”第

①（汉）扬雄著，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疏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13页。

②（汉）桓谭：《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1页。

③（南朝）范晔：《后汉书·班彪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357页。

④（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07页。

五，叹服司马迁的文采。班彪赞扬《史记》“文质相称”，《汉书》称司马迁等人“辩知，达，溢于文辞”，“文章则司马迁、相如”。

《史记》《汉书》叙事的比较，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开始，现存最早的马、班异同论见于《晋书·张辅传》：

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亦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①

张辅比较了《史记》《汉书》，认为《史记》在叙事上明显胜于《汉书》。主要表现在：一、《史记》叙事简练；二、《史记》叙事从大处落笔，中等琐碎事情不记；三、《史记》写人记事能够评价公允、客观公正；四、司马迁首创纪传体，难度远远大于班固的因袭模仿；五、《史记》叙事既有文采、辞藻华靡，又真实可信、详略得当，是一部优秀的史著。虽然张辅的“文字多寡论”常遭后人诟病，但他对《史记》《汉书》叙事优劣的主要判断是正确的，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

南北朝时期文尚骈俪，虽然《史记》文名不彰，但是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中仍涉及对《史记》叙事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刘勰确立了实录的叙事规范，充分肯定

^①（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40页。

了《史记》的“实录无隐”、“秉笔直书”（《文心雕龙·史传》）。二、刘勰对《史记》叙事结构有所肯定：“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辅政体，十表以谱年爵，晏殊古式，而得事序焉。”^①他认为，《史记》按本纪、列传、书、表分类，将政治、军事、制度、文化、外交以及人物包罗在内，容纳了千姿百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历史制度的变迁，从而建构了一个宏大有序、共时性与历时性交叉一体的富有生命感的叙事世界，所谓“得事序”；而这种用各种体裁来概括事件、人物、政治体制的结构体系又是司马迁的一种独创，所谓“殊古式”。

总之，起步阶段《史记》叙事的研究是粗浅的，特点是概括式的评语多，分析少。

（二）唐宋时期：发展阶段

唐宋时期奠定了《史记》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唐代编纂了《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八部史著，全都采用纪传体，从体例上确立了《史记》“正史”之尊的地位。唐宋科举制度中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为“三史”，并把“三史”作为科举考试的一科，形成了学习《史记》的良好风气。以司马贞《史记索隐》和张守节《史记正义》为代表的唐代《史记》注释的问世，既体现了唐人对《史记》研读的深入，也对《史记》的流传和推广发挥了巨大作用。唐代中后期，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史记》的文学批评逐渐摆脱对史学批评的依附地位，走向独立。唐宋时期专门论《史记》的文章、笔记数量大增，唐代有48位文人撰写《史记》论

^①（南朝）刘勰著，王运熙、周锋注：《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文，宋代有 69 位文人撰写了 381 篇《史记》论文。唐宋时期《史记》叙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史学家从史学理论上、古文家从写作技法上分别对《史记》的叙事进行了初步总结。唐代刘知几的《史通》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论著，其中许多篇章都涉及叙事，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叙事的重要性，（2）历史叙事的真实性，（3）历史叙事的繁简问题，（4）史书叙述的语言和所传人物语言的不同。《史通》在这四个方面给予《史记》很多肯定，但《史通》对《史记》叙事不合情理的地方也有指责。刘知几说：“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著史籍，贻误后学，不其甚邪！”^① 这是说司马迁混淆了文学虚构与历史事实的区别。刘知几站在史学家的立场批评《史记》的文学性虚构叙事，这是情理中的事。文人对《史记》的叙事技法也有总结，例如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指出《史记》的文章有“如骏马下驻千丈坡”的气势和力量，造成这种文章风格的原因是司马迁善于运用“重沓熟复”的方法。通过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造成语意的呼应，感情的回荡，增加文章的气势和力量。刘将孙在《萧达可文序》中说：“太史公之鼓舞变化，类常事小节，他人以为不足传者”，点出了《史记》善于以小见大的叙事特点。苏洵首先指出《史记》叙事上使用了“互见法”：

迁之传廉颇也，议救阙与之失不载焉，见之赵奢传；传

^① （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第四册），上海书店 1988 年影印本，第 48 页。

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繆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夫酈、食其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酈，辯如酈食其，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①

“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這就是《史記》的互見法。這個發現，開拓了《史記》研究的新領域，為人們進一步認識《史記》的寫人敘事提供了新的思路。

2. 《史記》體例——敘事結構的研究成為熱點。司馬貞在《史記索隱·序》、張守節在《史記正義·序》、劉知幾在《史通》“六家”、“二體”中對於《史記》所開創的紀傳體給予了許多肯定性的評價。尤其是皇甫湜專門寫了《編年紀傳體》一文，進一步細緻地分析了編年、紀傳二體的短長，盛贊了司馬遷創立的“五體”，他認為，紀傳體好處很多，可以傳之不朽。

3. 對《史記》的敘事風格進行了初步的總結。韓愈提倡向《史記》學習，認為《史記》“雄深雅健”，柳宗元也推崇《史記》，稱“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此後，“雄健”、“峻潔”成為《史記》美學風貌的定評。此外，蘇轍提出“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蘇轍此論開後世《史記》山川助文章的先河。

概言之，唐宋時期形成了史學家、文學家共同研究《史記》的新形勢，尤其是古文家開創了評論《史記》的風氣，使《史記》的敘事研究有了一定的拓展與深入。

^① 楊燕起等編：《歷代名家評史記》，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頁。

（三）明清时期：兴盛阶段

明代由于印刷技术的提高，为刻印《史记》提供了有利条件，明代刻印《史记》达二十多种，对于推动《史记》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由于文学复古运动的高涨，《史记》的研究价值随之提高。前后七子“文称左迁，赋尚屈宋，古诗体尚汉魏，近律则法李杜”（《续藏书·何景明传》），清代桐城派更是将《史记》抬到了古文宗主的地位，所谓“《史记》如海，无所不包，亦无所不有，古文大家，未有不得力此书者”。归有光评点的《史记》在当时被奉为秘笈，这既是对归氏的崇信，也是对《史记》的膜拜。

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应试文体八股文对写作规范有更加严格的要求，促使文人更加积极于文章写作技巧的挖掘，追求文章写作方法就出现了评点。清人刘声木《苕楚斋随笔》记载：“评点始于南宋诸儒，当时选本，若宋楼昉编《崇古文诀》三十五卷，宋吕祖谦编《古文关键》二卷，宋谢枋得编《文章轨范》七卷，卷中始有评点勾抹，后世皆称善本，即《四库提要》亦言其善。后来明人踵行其法，变本加厉，几于无一书不评点……其实评点能启发人意，固有益于讲说，姚姬传郎中鼐亦尝言之，曾文正公国藩至谓之评点学。”^① 明清两代掀起的评点高潮，将先秦两汉的散文评点殆尽，《史记》是评点率最高的一本书。明代《史记》评点家有八十多位，清代有三百多位，可见一斑。^②

明清《史记》评点主要是就文论文，从文章写法角度评论《史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杨慎的《史记题评》、茅坤的

①（清）刘声木：《苕楚斋随笔》，中华书局1998年版。

② 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页。